


吴福祥 © 著

# 语法化

## 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

YuFaHua Yu HanYu LiShi YuFa YanJiu

 安徽教育出版社


# 语法化

## 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

YuFaHua Yu HanYu LiShi YuFa YanJiu

吴福祥 ©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语法化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 / 吴福祥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7

ISBN 7 - 5336 - 4760 - 2

I. 语... II. 吴... III. 汉语—语法—文集  
IV. H1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7015 号

---

责任编辑:姚 莉

装帧设计:马 芳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瑞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10.75

字 数:290 000

版 次:2006年7月第1版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2 000

定 价:22.00元

---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822632

邮 编:230063

## 前 言

这本论文集选收我近年来发表的十二篇文章,内容涉及语法化、汉语历史语法和汉语方言语法史三个方面。现在把它们辑入成书,是希望得到更多专家学者的指正。

所收文章大都只在个别地方略作改动。只有《近年来语法化研究的进展》原先发表时因篇幅限制删去一段正文和部分参考文献,现在借此机会恢复原稿面貌;《南方方言几个状态补语标记的来源》原来在《方言》上分成两期发表,现在合为一篇。

安徽教育出版社万直纯先生、鲍康健先生和姚莉女士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谨致谢忱。

本书得到广西大学科研启动经费的资助,特此感谢。

吴福祥

2004年12月于北京

## 目 录

### 语法化研究

- 1 近年来语法化研究的进展
- 24 关于语法化的单向性问题
- 50 汉语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语法化
- 73 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  
——兼论SVO型语言中伴随介词的两种演化模式
- 107 语法化演变的共相与殊相

### 汉语历史语法研究

- 141 从“VP-neg”式反复问句的分化谈语气词“麽”  
的产生
- 159 重谈“动+了+宾”格式的来源和完成体助词  
“了”的产生
- 178 试论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来源

205 再论处置式的来源

239 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检讨与反思

### 汉语方言语法史研究

278 南方方言几个状态补语标记的来源

319 南方方言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带宾语的  
语序类型

## 语法化研究

.....

### 近年来语法化研究的进展

**提要** 本文从“语法化的单向性问题”、“语法化与仪式化”、“形式学派的语法化研究”、“语法化与语言接触”以及“主观化与交互主观化”等五个方面介绍了近十年来国外语法化研究的新进展,同时也对国内语法化研究的近况做了简单的勾勒。

**关键词** 语法化 单向性 仪式化 语言接触 主观化 交互主观化

“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指的是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产生和形成的过程或现象。典型的语法化现象是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语或结构式变成无实在意义、仅表语法功能的语法成分,或者一个不太虚的语法成分变成更虚的语法成分。在现代语言学中,研究这种语法化现象的理论通常被称为“语法化理论”或者“语法化学说”。

本文基于初步的文献调查,介绍近年来国外语法化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同时也对国内语法化研究的近况作一简单的勾勒。

#### 一 语法化的单向性问题

最近几年来,单向性(unidirectionality)无疑是语法化研究中争论最为热烈的一个问题。单向性是语法化理论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假设,指的是语法化的演变是以“词汇成分 > 语法成分”或“较少语法化 > 较多语法化”这种特定方向进行的。比如在下面的演变序列

中,若一个形态-句法演变只是按照由左向右的方向进行的,那么我们就说这个演变是单向性的,或者说是不可逆的。反之则是单向性的反例。

实义词 > 语法词 > 附着词 > 曲折词缀 > (零形式)  
(Hopper & Traugott 1993)

语法化的单向性是由 Givón(1975:95)首先明确提出并作出解释的,此后单向性一直被认为是语法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单向性问题的争论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这个争论很大程度上是由 Newmeyer(1998)引起并由 Lightfoot (1999,2002) 以及 Janda (2001) 和 Joseph(2001)等学者所推动的。Newmeyer(1998)专门有一章叫做“解构语法化”,列举了大量的所谓单向性反例,以否认单向性的存在。不仅如此,Newmeyer 甚至宣称“根本没有语法化这样的东西”。Lightfoot (1999)则指责单向性的研究本质上是 19 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东山再起。此后,《语言科学》(Language Sciences)专刊(2001,23.2-3,由 Lyle Campbell 编辑,收有 Campbell、Joseph、Newmeyer、Norde、Janda 等五人的文章)整个一期几乎无例外地致力于否定单向性的理论价值,并提出反对单向性的各种理论和经验上的证据。此外,支持或同情上述观点的文章在最近三四年也相继发表,例如 Beths (1999)、Lass(2000)、Fitzmaurice (2000)、Geurts (2000a,2000b)、Kim (2001) 以及 van der Auwera (2002)等。

另一方面,Haspelmath (1999a, 1999b, 2002)、Traugott (2001a,2002)以及 Heine (2002)、Heine & Kuteva(2002)等学者则力主单向性的有效性,对 Newmeyer 等学者的观点和论据做了有力的辩驳。目前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是:(1)语法化演变的单向性是一个强烈的倾向而非绝对的原则;(2)单向性假设显示出形态-句法演变的普遍制约,是对人类语言演变共性的一种概括,因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单向性问题的争论仍未结束,2002 年 4 月在阿姆斯特丹大学举行的第二届“语法化的新思考”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与会代表所提交



的七十余篇论文中有三分之二的文章涉及单向性问题的讨论,以致会议召集人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 Olga Fischer 决定将语法化的单向性原则作为该会议论文集的一个主要主题。

## 二 语法化与仪式化:语法化的频率条件和重复机制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从事语法化研究的学者普遍将频率看做语法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或因素。(参看 Traugott & Heine 1991a; Hopper & Traugott 1993; Traugott 1996a; Krug 1998; Bybee & Scheibman 1999; Haspelmath 1999a, 2000, 2001; Fisher et al. 2000; Bybee 2001b 等) Haspelmath(2001)从语言演变的共性角度将语法化的频率条件概括为“一个语法化的候选者相对于其他参与竞争的候选者使用频率越高,那么它发生语法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语法化的频率效应可以在跨语言的形态-句法演变中普遍观察到。Haspelmath(2001)认为下面的语法化现象都是频率效应作用的结果:

(1)所有格词缀与不可让渡名词(在很多语言里,所有格代名词被语法化为只能带不可让渡名词的词缀);(2)反身词缀与自身指向动词(在很多语言里,反身代词被语法化为只能带跟自身指向动词同现的词缀);(3)处所格词缀与无生名词[在很多语言里,格词缀只限于特定语义类的名词(譬如无生名词)];(4)现在时助动词与过去时助动词[英语现在时助动词发生附着化(cliticize)而依附于一个宿主(host),但过去时助动词则不存在这种演变];(5)双数和三数(有些语言里具有双数范畴但没有三数范畴,这是因为数量“二”普遍比数量“三”出现频率高)。

语言项频率的高低是由重复的频度造成的。为什么重复会导致一个语言项发生语法化呢? Haiman(1994)从心理学和生态学的角度对此做了系统而深入的解释。Haiman 认为,像人类所有的建制(institutions)一样,人类语言也在使用中发生变化,特别是语法由于

话语在时间中不断重复而发生变化。Haiman用“仪式化(ritualization)”来概括由重复导致的三个相关的演变过程:(i)“适应(habituation)”、(ii)“解放(emancipation)”和(iii)“自动化(automatization)”。 “适应”、“自动化”和“解放”分别是心理学和生态学的重要机制。在“适应”的过程中,刺激(stimulus)的高频重复使得反应者对刺激物的反应持续减弱,最终导致刺激物的形式和意义被磨蚀。在人类语言中“适应”不仅体现在问候语和陈词滥调(cliches)的形成上,通常也表现在语法化过程中:重复可以导致形式的弱化,也可以独立地使意义变得虚化。重复的另一个后果是“自动化”。Haiman认为自动化可能是双层组构(double articulation)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双层组构中一个最小的意义单位(词或语素)是由若干更小的无意义的单位组成的。因为无意义的单位是原来有意义的单位经过“语素>词缀>音位”这种连续演变之后留下的遗迹(remnants),所以重复不仅体现在语法化早期阶段和最后阶段,同时也表现在双重组构本身的来源上。“解放”指的是一个工具性行为(instrumental action)变得跟它原来的主要动机相分离,从而自由地表达信递(communication)功能,并进一步获得意义,变成一个符号。Haiman指出,不仅其他物种的很多信递行为来源于原本非信递行为的“仪式化”,人类语言的各种现象也是在“解放”过程中获得其来源的。比如音位化(phonologization)、重音和语调的仪式化以及固定语调模式的产生等。不仅如此,Haiman进一步认为,语言本身也可以被看做一种从工具功能中解放出来的行为。

Haiman(1994)所论证的语法化与仪式化之间存在的高度平行关系引发了很多学者的兴趣,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语法化过程中的若干语音-音系、形态-句法和语义-语用演变,进而重新思考语法化的机制。此后,Boyland(1996)、Dahl(2000)、Bybee & Thompson(2000)、Bybee(2001a, 2001b, 2001c)和Haspelmath(2001)等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重复及频率在语法化过程中的基本作用。

Boyland(1996)指出,语法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形式上的演变跟非

语言的技能通过反复练习而变得自动化的演变极为相似。由于重复,若干原本独立的单位所构成的序列逐渐被处理为一个单一的单位或者组块(chunk)。这种重新包装(repackaging)有两个后果:(i)组成单位的个体身份逐渐消失;(ii)整个组块在形式上开始缩减。这种自动化原则可以应用于各种运动神经活动(motor activities),譬如演奏乐器、从事体育活动等;而且同样也适用于语法化,比如几个世纪以来频繁使用的短语(I'm)going to(VERB),已经被重新包装为一个单一的加工单位,其组成部分的个体身份逐渐消失(孩子常常惊讶地发现 gonna 实际上拼写的是 going to),该短语的形式也大大缩减。Boyland (1996)的研究表明,类似的情形在很多语法化过程中都可以观察到。

Bybee(2001a)认为,语法化过程中从词汇功能到语法功能的演变,其实是一个“解放”的过程。在莎士比亚的英语中,be going to 具有“空间上朝一个目标位移”的字面意义。不过,假定人们对位移目的有明显的兴趣时,甚至在莎士比亚的英语里,be going to 的信息值也是较多地跟目的相关而较少跟空间位移关联。因为 be going to 频繁地与这种使主体意图也得以显示的语境相联系,所以导致它逐渐从原来空间位移的意义中被解放出来,表达目标或意图的新功能也逐渐成为这个结构式的主要功能。另一方面,语法化过程中的语义泛化和虚化则高度平行于“适应”过程。就像刺激的高频重复会使反应者对刺激物的反应持续减弱、最终导致刺激物的形式和意义被磨蚀一样,一个词、词组或结构式的高频重复也会减少其语义力量和信息值。

Bybee(2001b)对仪式化的各种特征在语法化过程中的对应表现以及重复在语音、形态-句法和语义-语用演变中的基本作用做了更为具体的考察。跟 Haiman(1994)一样,Bybee(2001b)也认为语法化过程本质上就是仪式化。因为仪式化(“适应”、“自动化”和“解放”)的发生导源于重复,所以 Bybee(2001b)强调语法化的最基本机制是重复。有鉴于此,Bybee(2001b)从突显重复在语法化过程中的

决定性作用这个角度将语法化重新定义为:一个频繁使用的词汇序列或语素序列自动化为一个单一的加工单位。

事实上,重复和频率不仅作用于语法化演变,人类语言中大量的形态句法、音系、语义和词汇现象的产生和演变都跟话语的重复密切相关。1999年5月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举行的“频率和语言结构的显出(Frequency and the emergence of linguistic structure)”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重复和频率在语言结构的产生和演变中的重要作用。该会议的论文集《频率和语言结构的显出》2001年由Joan Bybee和Paul Hopper编辑出版。此外Joan Bybee在2001年出版的《音系学与语言使用》更是将重复和频率看做语音和音系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重复不仅是语法化及其他语言演变现象的重要机制,也是大量文化和生态现象发生仪式化的根本动因。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语法化现象是否具有一个独立的机制。Haiman(1994)、Dahl(1999)、Bybee(1998, 2001b)以及Haspelmath(2001)等学者都认为,语法化最基本的机制既非特域的(domain-specific),也非特种的(species-specific),因此,高度抽象且至今仍很神秘的语法性质有望用更为普遍(general)的术语来加以诠释。

### 三 形式学派的语法化研究

众所周知,由Givón(1971, 1975, 1979, 1984)和Lehmann(1995 [1982], 1985)等学者发展起来的当代语法化理论,在语言及语言演变观上是功能主义取向的;而在历史句法研究领域里,功能学派和形式学派之间在一些基本假设和研究范式上相当对立(参看Harris & Campbell 1995)。因此我们很容易想到,语法化研究跟形式学派的历时句法研究模式是不容易相容的。但事实上,近年来语法化研究已逐渐被纳入形式学派的历时句法研究之中。(参看Abraham

1993, Newmeyer 1998, Haspelmath 1998) 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 形式学派阵营里的学者开始尝试运用生成语法理论和研究模式来研究功能范畴的语法化, 以求“对语法化现象作出真正的解释”(Roberts 1993a)。1997 年 8 月在德国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大学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历史语言学大会期间还专门举行了一次“语法化的形式学派研究模式(Formal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学术讨论会。生成学派之所以涉足语法化研究, 可能跟生成语法理论近些年的发展有关。我们知道, 自 Chomsky(1986)发表以后, 功能范畴被引入生成语法框架。在最近十余年来逐渐完善起来的短语结构理论和 X-标杠等理论框架里, 像限定词(determiner)、标补词(complementizer)和一致关系标记(AGR)这类功能范畴成分被普遍看做短语结构的中心语。而历时地看, 这些功能中心语都来源于词汇成分或词汇中心语。正因为如此, 历时生成语法研究开始注意语法化现象(参看 Fisher & Rosenbach 2000)。

据我们粗略的调查, 形式学派语法化研究的成果主要有 Roberts (1993a, 1993b)、Warner (1990, 1993)、Simpson (1997)、Beths (1999)、Roberts & Roussou (1999)、Wu (2000)、Gelderen (2000, 2001a, 2001b, 2002)、Kayne (2001)、Simpson & Wu (2002)。这些研究多数关注于助动词的语法化演变, 也有少数文献涉及一致关系标记、反身代词、疑问代词、否定标记等其他语法标记的语法化研究, 比如 Roberts & Roussou (1999) 和 Gelderen (2000, 2001a, 2001b, 2002)。此外, Wu (2000) 是一篇运用生成语法理论研究汉语量词“个”、体标记“了”、结构助词“的”以及动结式等功能范畴产生过程和语法化机制的博士论文。

形式学派的语法化研究以乔姆斯基语言学中的功能范畴和中心语移位理论以及修改版最简方案的句法研究模型(Chomsky 1995)为理论背景, 以 Lightfoot (1979, 1991, 1999) 的历时句法理论为基本框架, 试图对文献里经常提及的若干语法化现象作出形式主义的解释。其基本假设是, 语法化本质上是词汇范畴被重新分析为功能范

畴的过程,语法化现象之所以普遍可见,是因为重新分析往往涉及结构简化,体现了语言习得的省力策略,而结构简化则是一种为参数定值所偏爱的演变。

#### 四 语法化与语言接触

传统的语法化研究大都是在假定的同质演变的状态下进行的,这种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语言演变的一元发生(monogenetic)模式这样的假设之上的。事实上,正如 Hopper & Traugott(1993)所强调的,“严格的语法化一元发生观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研究模式忽略了大量的由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语法化研究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发生在语言接触状态下的语法化演变。这类研究主要是从下述两个方面进行的。

其一是探讨在一个特定的标准语里由语言接触等外部因素导致的语法化过程。任何一种语言在其演变、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跟其他语言发生接触。(参看 Thomason 2001)语言接触常常会导致形态-句法成分的借用和影响,Weinreich(1953[1968])、Thomason & Kaufman (1988)、Gerritsen & Stein (1992)、Harris & Campbell (1995)、Campbell (1999)以及 Thomason (2001)等报道了大量的句法借用(syntactic borrowing)和句法影响(syntactic influence)的事实。Harris & Campbell(1995)和 Campbell (1999)甚至将句法借用视为句法演变的三个机制之一。Gerritsen & Stein (1992)则将语言接触及由此导致的句法借用和句法影响看做句法演变的一个重要外因。对句法演变的外部机制和动因的关注,使人们不断地发现,以往被认为是发生在一个语言内部的语法化现象其实是由语言接触导致或诱发的,比如 McColl Millar (2000)证明,语言接触在英语定冠词的语法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Harris & Campbell (1995)则列举大量的事实证明句法借用常常和重新分析(reanalysis)、扩展(extension)等机制一起造成大量形态-句法现象

的产生和演变。语言接触不仅会通过句法借用和影响促成特定语法化过程的发生,而且还可以导致语法化机制的跨语言扩散。Bisang (1998)认为,语言联盟(Sprachbund)的出现很可能是由语法化机制的跨语言扩散造成的,特别是当语言接触达到一定深度时,说话者/听话者可以将其母语中业已存在的重新分析的机制转移到另外的语言中去。

其二是研究皮钦语和克利奥尔语中的语法化现象。皮钦语和克利奥尔语是由语言接触造成的两种接触语言(contact languages)。一般认为,皮钦语产生初期语法范畴和语法形式比较贫乏,当皮钦语固定化以后语法范畴和语法形式逐渐增加;而皮钦语一旦克利奥尔语化(creolize),语法形式则更加丰富。因此探讨皮钦语和克利奥尔语的语法化过程及其机制无疑有助于语法化理论的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皮钦语和克利奥尔语被认为是“语法化研究的金矿”(参看 Heine & Kuteva 2002)。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 Bruyn(1995)和 Baker & Syea(1996)。Bruyn(1995)是一部研究苏里南(Sranan)克里奥尔语语法化的专著,讨论了包括 gi“give”用做受惠格标记在内的大量的语法演变的实例。Bruyn (1995)的研究表明,当皮钦语克里奥尔语化时所发生的语法化过程(比如一个独立的词汇项变成形态标记)常常并不是克里奥尔语内部发展的结果,新的形态标记其实是从低层语(substrate language)直接移入的。这个结论也许能有效地解释为什么克里奥尔语常常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新的语法形式。Baker & Syea(1996)是一本文集,代表了克里奥尔语语法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在这个论文集里,Bruyn(1996)基于对苏里南克利奥尔语中若干语法结构式的观察,区别了克利奥尔语语法化的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常规语法化(ordinary grammaticalization)”,即语言内部语法标记和结构的渐变;第二种类型叫做“瞬间语法化(instantaneous grammaticalization)”,其区别于常规语法化之处是“通常逐渐进行的演变在克利奥尔语化过程中可以在很短的时间跨度中发生”;第三种语法化类型是“外表语法化(apparent

grammaticalization)”。Bruyn 认为这种语法化其实是低层语语法成分移入的结果。比如在分析 Sranan 语复合介词短语时, Bruyn 指出这些看似语法化的现象事实上是“发生在另外语言中的语法化结果的移入”。

很多研究皮钦语和克利奥尔语语法化的文献都提到,接触语言的语法化过程往往表现出跟标准语不同的特性。比如单向性和渐变性被认为是标准语语法化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但这两个特征在接触语言的语法化过程中常常被违反,换言之,皮钦语和克利奥尔语的语法化过程常常呈现出非单向性和抄近路的特征。(参看 Keesing 1991; Plag 1993, 1994; Mufwene 1996; Lumsden 1997; Smith 1996; Syea 1996; Turchetta 1998)但 Plag(2002)认为,这些被认为违反了单向性和渐变性的语法化实例多数都是低层语语法成分的移入,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语法化现象。Plag(2002)主张,只有区分内在演变和由接触引发的演变,我们对克利奥尔语化和语法化的性质才能有一个新的比较深入的认识。Plag 认为基于语言内部的演变一定符合语法化理论确立的原则,而对这些原则的违反可以被解释为由外部因素导致的。Bruyn(2002)指出,存在于低层语的语法化模式或语法化链可以充当语法成分移入克利奥尔语的通道(channels),但低层语的语法化模式也会导致被移入的某一语法成分在克利奥尔语中出现不可预测的重新分析或转化,以致违反了通常的非范畴化(decategorization)和语法化的方向。

## 五 主观化与交互主观化

在日常的话语交际中,说话人不仅要表达命题意义而且要表达言者意义,而后者体现了语言的主观性(subjectivity)。所谓语言的主观性,指的是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参看 Lyons 1977, 1982; Finegan 1995; 沈家煊 2001)如果这种主观性在语言中用



明确的结构形式加以编码,或者一个语言形式经过演变而获得主观性的表达功能,则谓之主观化(subjectivization)。语言学家对主观化系统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主要有共时和历时两种研究取向。前者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探讨一个时期的说话人采用什么样的结构或形式来表现主观性,代表性人物是Langacker (Langacker 1985, 1990, 1999);后者从历史语言学角度考察一个主观性的结构或形式是如何演变而来的,代表性人物是Traugott (Traugott 1982, 1985, 1988, 1989, 1991, 1995a, 1995b, 1996b, 1997, 1999a, 1999b, 1999c, 1999d, 2000a, 2000b, 2001b; Traugott & König 1991; Traugott & Dasher 2002等)。Traugott最早将主观化纳入语法化的研究框架(参看Traugott 1989),并从语法化的角度对主观化作出定义:主观化指的是“意义变得越来越植根于说话人对命题内容的主观信念和态度”这样的一种语义-语用的演变过程。Traugott强调主观化是语法化的一个重要机制(参看Traugott 1999c, 2000b),认为语法化中的主观化表现在下面几个互相联系的方面:

由命题功能变为言谈功能;由客观意义变为主观意义;由非认识情态变为认识情态;由非句子主语变为句子主语;由句子主语变为言者主语;由自由形式变为黏着形式。(Traugott 1995a)

语言不仅能表达主观性,而且还常常表达交互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交互主观性指的是说话人/作者用明确的语言形式表达对听话人/读者“自我”的关注。这种关注可以体现在认识意义上,即关注听话人/读者对命题内容的态度,但更多的是体现在社会意义上,即关注听话人/读者的“面子”或“形象需要”(Traugott 1999a)。交互主观性派生于主观性并以后者为蕴涵,换言之,一个语言形式如果具有交互主观性,那么也一定呈现主观性。从历时角度看,语言形式的交互主观性是通过交互主观化过程而产生的。所谓交互主观化(inter-subjectivization)指的是这样的—个符号学过程(semasiological process):意义经由时间变成对“有关说话人/作者在认识意义和社会意义上对听话人/读者‘自我’的关注”这样的隐涵义加以编码或